

新 路

经济随笔与短论集

曾牧野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99
F120.2
149
2

新 路

——经济随笔与短论集

曾牧野 著

ZAB4726



广东经济出版社



3 0037 5827 7

责任编辑 李远谋
封面设计 刘伟雄

新 路
——经济随笔与短论集
曾牧野 著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 (广东省番禺市桥镇环城西路工农大街 45 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2 千字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 - 1000 册
书号	ISBN 7-80632-356-2/F·172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曾牧野 1987 年摄于广州从化森林公园



1988 年春节曾牧野与夫人吴翹

前　　言

读书，我一贯主张“学以致用”；即要“钻进去”，又能“爬出来”，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想想有什么办法来改进、完善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古人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吧。

经国济世，谈何容易。我着力写一些参与社会实践的小小感受。即便如此，也尽力寻求一种生动通俗的文字表述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而不喜欢写学究式的文章。

编完《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这本厚厚的论文集后，我发现在我书柜里保存的改革开放年代写的一百几十篇小文章，似可编辑成册，公诸社会。

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阐发了一个伟大的科学论断：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 20 年的中国，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全党、全国人民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道路这是何等英明的战略性决策！

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经历，人们深深体会到：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是同观念上的破旧立新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

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是以观念上的更新作为前提条件的。

《新路——经济随笔与短论集》全书 136 篇，约 32 万字。平均每篇文稿 2000 多字。第一部分收入的主要 是经济随笔，第二部分收录的是学术性短论。第三部分，是关于怀念故人、追忆往事——包括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如何成长起来的回忆性文章。

第三部分还收录我 60 年代初、中期写的几篇随笔，我想借此机会作点说明。因为 1959 ~ 1965 年，是我一生中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勤奋写作的成长阶段。当时，我在一个“冷门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办公室工作。由于个人的爱好与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我用田牧、丘谷间、阿令、谷娟等笔名，写了将近 200 篇政论性杂文、经济随笔等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也由于写作、投稿、“串门子”等因素，我结识了著名作家，当时在《羊城晚报》任副总编辑的秦牧同志，著名诗人、当时在《广州日报》工作的野曼同志，著名作家、当时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岑桑同志，还有在《南方日报》理论部工作的饶子持同志等。鼓励、支持我写作的还有我的老领导孙孺同志、我的老同事杨樾同志等。1965 年的夏天，广东人民出版社理论编辑室负责人要我把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编辑成册，考虑予以出版。我应允了。1965 年 8 月结集编好一本 25 万字的《问路集》，其中一份留交本机关的一位同事代我保存。接着，1965 年 9 月，我奉命到阳春县三甲公社曲岗大队龙塘村参加“四清”运动。从此，中断了青年时代的写作生涯。1966 年 6 月，我被当作“孙孺反党集团”的“黑帮”成员从农村揪回机关，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批斗”洗礼。《问路集》出不成，收入的那些小文章，居然成为“批斗”我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一颗颗“有力的炮弹”。接着，1968 年 12 月机关“拆庙搬神”，全部科研人员、行政干部一律到英德黄陂“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浩劫长达 10 年，

1965年8月编就的《问路集》也不知散失、丢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终于来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人劝我把60年代初、中期写的那些文章，编辑成册。我思之再三，打消了重新结集出版的念头。一来要寻找、复印过去的100多篇文章，颇费精力、时间，二来那年代写的东西难免留有“左”倾思潮的痕迹。这么一想，也就免了。但是1959～1965年这6年，总是令人难忘的勤奋耕耘的岁月，所以我挑选了1960～1964年写的8篇随笔、杂文，安排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以示纪念，并供读者鉴赏：这些千把字的文章，是否沾有“修正主义”的味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跨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面临崩溃的中国，又获生机。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又重新拿起笔来，怀着满腔热情，讴歌新时代的到来，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道路。全书90%以上的文章，是短论，是随笔。其中仅有三几篇较长篇幅的文章，不甘割爱，也收录进来。例如，《关于两个文明建设关系》，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拿出去发表。近日，重读此文，觉得当时的思路、观点还是对的，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所以收入。再如第三部分的《深切怀念理论大师卓炯》一文，长达1万字，主要是考虑过去报刊上介绍、怀念卓炯的文章，多数是谈卓老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上的贡献。卓老的为人如何，较少涉及。1994年6月，依据我与卓炯共事多年经历，著文记述卓老的高尚人品，企求填补这方面的空缺。黄钟同志，是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入党介绍人，他的教诲与引路，对于我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走向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所以，近日著文，追述此事，表示我对黄钟老师的永远思念。

《新路——经济随笔与短论集》一书能够结集出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吴翹。改革开放以来，她把我曾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剪贴好，珍藏起来。此次编书，她帮我抄写目录、计算每一

篇文章的字数；还帮我核对个别篇章引用的古代成语。其次，还应该提及陈学工同志，1985年他在我们单位工作时，帮我寻找发表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整理一份部分文章发表年月、发表报刊的“目录”，花去他不少时间、精力。感谢他对我的著作生涯的关注与支持！

存在决定意识。在探索新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难免发生某些认识上的偏误。本书所收文章，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教正。

此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汕头海洋集团公司及其总经理李国俊先生的大力支持、资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8年5月18日

目 录

前言 曾牧野 (1)

第一辑

“恭喜发财” (1979年1月)	(1)
再谈“恭喜发财” (1980年2月)	(3)
经济数字和经济监督 (1979年6月)	(5)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1980年2月)	(7)
试答利润留成比例的争议 (1980年5月)	(9)
文明经商小议 (1980年6月)	(11)
“拳头”产品与智力投资 (1980年6月)	(13)
温故知新 (1980年7月)	(16)
破“茧”而出 (1980年7月)	(18)
为了人民的幸福 (1981年3月)	(20)
为何“墙内开花墙外香”? (1981年3月)	(23)
受赞扬的“蛇口方式” (1981年9月)	(26)
为改进服务消费进一言 (1982年12月)	(29)
再为改进服务消费进一言 (1983年1月)	(32)
本是同根生 (1983年1月)	(34)
农贸市场的冲击波 (1983年12月)	(36)
“珠浦酥糖”的联想 (1984年3月)	(39)
汕头小食要向外拓展市场 (1984年4月)	(40)
打破旧框框 搞活市场 (1984年4月)	(42)

“南方大厦”的营销经验（1984年4月）	(44)
一家富裕与家家富裕（1984年4月）	(47)
并非“评报”之说（1984年3月）	(50)
塘鱼生产与价值规律（1984年12月）	(51)
走“扩权”之路（1984年5月）	(58)
小论开放型的广州市场（1984年12月）	(60)
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一种社会管理形式（1985年9月）	(63)
引进新技术不能“一刀切”（1985年11月）	(65)
在改革中求发展增效益（1986年8月）	(68)
过桥收费及其他（1987年8月）	(71)
从荔湾“故衣街”谈起（1987年6月）	(73)
价格改革市场化（1988年3月）	(76)
价值规律客观地在发生作用（1988年3月）	(77)
发展外向型经济之我见（1989年4月）	(78)
“网开一面”的几点建议（1989年6月）	(80)
搞活流通是广州的突出优势（1989年10月）	(84)
铸我厂魂（1989年10月）	(86)
气可鼓而不可泄（1990年2月）	(88)
改革开放 古城生辉（1990年5月）	(91)
深圳特区第二个10年如何发展？（1990年7月）	(94)
质量、效益与生产目的（1991年3月）	(96)
论开发建设大亚湾（1991年10月）	(98)
正视困难 寻找出路（1992年3月）	(104)
论开发建设南澳岛（1993年8月）	(107)
论速度与经济之冷热（1994年6月）	(109)
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作用（1994年12月）	(115)
《1995年广州经济发展蓝皮书》序（1995年2月）	(117)
让“珠三角”继续先行一步（1995年1月）	(119)

继续推进“珠江三角洲”现代化建设（1995年6月）	（121）
联手治暴利（1995年7月）	（124）
现代化酒店建设的一盏明灯（1995年7月）	（126）
长中国人的志气（1996年12月）	（129）
现代市场经济的热切呼唤（1997年3月）	（131）
要突出中心城市对流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1997年12月）	
	（133）
“回归”后加强粤港经济合作之我见（1997年12月）	（135）

第二辑

面向“四化” 开展经济理论研究（1980年3月）	（139）
把市场经济作为综合改革的目标模式（1988年5月）	（141）
要弄清经济体制与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概念之别（1983年5月）	
	（143）
关于两个文明建设关系问题（1984年7月）	（144）
改革和建设互相促进（1985年10月）	（154）
论建立价格调节基金（1987年6月）	（157）
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1987年11月）	（159）
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点体会（1987年11月）	
	（162）
澄清一种误解（1988年1月）	（165）
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几点意见（1988年9月）	
	（168）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1989年10月）	（171）
三个“不能变”（1989年3月）	（175）
互补互利 同舟共进（1989年5月）	（177）
价格改革 功不可没（1991年5月）	（181）

如何控制住物价（1989年2月）	(183)
理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1989年10月）	(186)
深化企业改革之我见（1989年12月）	(191)
求实稳健 迎接90年代（1990年1月）	(192)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重大贡献（1991年4月）	
	(195)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91年6月）	
	(199)
加大改革分量 维护政策连续性（1991年3月）	(202)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1992年10月）	(205)
市场经济：重大的战略决策（1992年10月）	(207)
不搞市场经济，就是自甘落后（1992年10月）	(209)
市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11月）	(210)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2月）	(212)
积极推进股份制试点工作（1993年7月）	(216)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特区经验（1993年7月）	
	(218)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1993年11月）	(220)
再学邓公南巡讲话（1993年4月）	(222)
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1994年7月）	(224)
就“宏观调控”问题答《广州日报》记者问（1993年8月）	
	(224)
要给经济特区更充分的试验权（1994年10月）	(228)
《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序（1995年3月）	(231)
关于推进“体制建设”的几点意见（1995年7月）	(234)
信心从哪里来（1995年7月）	(240)
进一步发挥港口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95年8月）	
	(243)

论“两铁”建设与粤东经济增长带的形成（1996年1月）	(246)
重在实干（1996年1月）	(253)
关于企业文化建设与深化企业改革（1996年1月）	(255)
维护大局 促进两个转变（1996年8月）	(261)
理论的源泉与生命力在于实践（1996年11月）	(264)
走向成熟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区（1996年6月）	(266)
在群众中生根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1997年2月）	
	(267)
《求是录》序（1997年4月）	(268)
“航空母舰”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搏击前进（1997年7月）	
	(271)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1997年10月）	(274)
十五大的重大贡献（1997年10月）	(276)
股份制≠私有化（1997年9月）	(279)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1997年10月）	(281)
必须系统地研究贯彻邓小平理论（1997年12月）	(284)
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经济学武器（1993年8月）	(288)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亟需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	
通力合作（1995年11月）	(296)
革命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1994年2月）	(301)
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998年4月）	(307)
观察形势：分清主流与支流（1998年8月）	(309)

第三辑

我与书本（1989年1月）	(313)
怎样看待社会科学的价值（1983年2月）	(314)

痛悼孙孺同志（1987年7月）	(317)
哭卓老（1987年7月）	(320)
深切怀念理论大师卓炯（1994年6月）	(323)
深切怀念孙孺同志（1998年7月）	(336)
我与“我们书室”（1986年8月）	(343)
山沟里的“社会大学”（1992年3月）	(346)
深切怀念曾广同志（1994年5月）	(351)
永远思念黄钟老师（1998年5月）	(357)
我与冰兄（1992年9月）	(366)
我与幼年期的《学术研究》（1998年2月）	(369)
钢与渣（1960年10月）	(372)
问路（1961年5月）	(375)
费尔巴哈与余笑娟的家史（1963年11月）	(377)
“爬起来”的勇气（1963年12月）	(380)
答“甘居落后论”者（1964年4月）	(383)
“除帐”志喜（1964年5月）	(385)
透透煤炉（1964年10月）	(387)
登摩星岭有感（1964年11月）	(390)
“提拔”一议（1980年6月）	(392)
献给“马列主义老太太”（1980年6月）	(394)
到人民中间去（1980年7月）	(397)
埋在人民心灵深处的愿望（1980年7月）	(399)
美好的祝愿（1980年2月）	(401)
附：曾牧野——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	南苑 (403)

第一辑

“恭喜发财”

(1979年1月)

中国人民富有民族特色的农历新年明天就到了。借用一句老话，给日日夜夜奋战在经济战线上的职工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恭喜发财！为社会主义发财。

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可以讲发财么？可以。财者，资金也。想一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该需要多少资金啊。光说八年计划（1978～1985年）吧，国家打算建设的120个重点项目，据外国经济学家测算，就需好几千亿美元。

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是靠财政部，也不是靠国家银行。这些部门本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真正的生财之地，是社会主义的工农企业。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全民所有制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税金。小部分来自农村社队上缴的农业税。这些财政收入的总和，形成社会基金。这个社会基金，经过国家财政的计划安排，一部分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叫做消费基金；另

一部分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叫做积累基金。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担负着多么重大的任务。第一，如果没有职工同志们创造的企业利润，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的积累，所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就等于空话。第二，如果没有利润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基金，莫说谈不到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就连我们这些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人，都得喝西北风。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要生存下去也难乎其难。对此，革命理论大师恩格斯说过极其深刻的话：“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乃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这个道理，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利润，就是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形式。我们说，利润越多越好，也就是剩余产品、社会财富越多越好。“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利润，说社会主义企业“不能讲赚钱”，“不能讲成本”，甚至狂吠“利润越低越好”，这纯粹是造谣惑众！

现在，把话说回来：为社会主义发财，靠什么？一靠开源，二靠节流。

开源，即千方百计增加产品数量（指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两个门路，一是增加劳动力，或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二是改进技术，革新设备，提高劳动技能，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说，主要靠后一条。

节流，就是通过节约原材料，降低动力消耗，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方法，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节流的巨大意义是：在企业年产量已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是节约，成本越低，利润越大；反之，浪费越大，成本越高，利润越小。

我们的企业，若能开源，又能节流，就真正是“生财有道”。生社会主义之财，合社会主义之道。

春天一到，万象更新。农民们，将在新春的季节里，播下结实的种子，也同时播下丰收的希望。工人们，也满怀信心，奋发图强，确实是值得恭喜的大好事。当然，要为社会主义发财，并非恭喜一声就能奏效，因为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经济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应该为社会主义发财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贡献各自的力量。

再谈“恭喜发财”

(1980年2月)

去年春节前夕，我写了一篇题曰《恭喜发财》的短文，刊在《广州日报》上，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议论中，有褒，也有贬。

褒者说，搞社会主义，现在有人敢讲“发财”了；不仅要讲，还要“恭喜”一番呢。

贬者不同意提“发财”，对拙文持怀疑、否定的态度。现在，又值新春，我来一个《再谈》，兼答贬者的非议。

贬者的根据，是说斯大林不同意提“发财”的口号。我查了《斯大林全集》，当中确有“发财吧”是一个早已被党摒弃了的旧口号的提法。（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6页）这里，斯大林反对的，是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发财”。显而易见，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发财”，意味着剥削，意味着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当然是要反对的，而且不允许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事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等种种资本主义活动。

但是，去年拙文所谈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发财”，而